

第一章

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 上古战争与国家起源

-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 黄帝战胜蚩尤的涿鹿之战
- 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
- 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 启伐有扈
- 尧舜禹禅让
- 夏启确立“家天下”统治秩序

一、炎黄文明的奠基战——涿鹿鏖兵

自从人类打开战争这个“潘多拉”魔盒之后，铁马金戈、硝烟鞞鼓也就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基本色调之一。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畸儿，它厮杀着生灵，吞噬着财富，在同类相残的累累白骨上，不断地推动着历史车轮曲折向前，聚积着最终将迫使它本身渐渐归于消亡的巨大能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战争在这块黄土大地上找到了可供自己淋漓尽致表演的广阔舞台。其中，黄帝战胜蚩尤的涿鹿之战，称得上是揭开中国古代战争史帷幕的重要一战。

大约距今五、六千年间的原始社会末年，在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它们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和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陕西地区、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过阪泉一战，黄帝部族战胜了炎帝部族，成为本集团的领袖，两族趋于融合，并沿着黄河两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全面推进，在到达今太行山以东地区后，便在那里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首领蚩尤的统率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双方之间为扩大各自的生存空间，争夺适于浅耕和牧放的中原地带以及实行血亲复仇，而不断地发

生冲突。这种冲突日益激化升级的结果，就只能是导致大规模的武装交锋，以一决雌雄，涿鹿之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面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部众勇猛剽悍，骁勇善战，而且又善于制作精良坚利的兵器“以金作兵”战斗力很强“威振天下”。其推进到今河北涿鹿县一带古称涿鹿的地方后，首先同先期抵达那里的炎帝族展开了一场厮杀。蚩尤族实力强大，攻势猛烈，炎帝族根本抵挡不住，被迫撤离“九隅”向西败逃，同时向同集团的黄帝族请求救援。

黄帝族为了履行同一联盟中兄弟部族互相救助的义务，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应允了炎帝族的吁请，收拢炎帝族溃散的族众，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一来，便同锋头正健、踌躇满志的蚩尤族再度在涿鹿一带遭遇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鏖战就此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当时蚩尤部族集结了所属的 9 个氏族 81 个支族的人马，在力量上占有相对优势。所以，双方势力接触后，它便依仗着自己人多势众、武器比较精良等条件，先发制人，气势汹汹地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面临强敌，方寸不乱，镇定自若，率领以熊、黑、狼、豹、雕、龙、鸱等为图腾的氏族，沉着应战，并让“应龙蓄水”，即充分利用己方位处上游的有利条件，在河流上筑起土坝蓄水，以抑制蚩尤族的凌厉攻势。

“战争”初期，适逢恶劣的天气，浓雾弥漫，大风呼啸，暴雨倾注，这种气候条件，很适合于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而相当不利于习惯在晴旱天气环境中作战的黄帝族，使得它连战皆北，“九战九不胜”，处境危殆。然而

时隔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样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宝贵的时机。黄帝族及时捕捉住战机，在玄女族的有力支援下，向蚩尤族发动猛烈的反击。

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黄、炎两族上下同仇敌忾，决心和对手决一死战。其首领黄帝因势利导，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条件——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劲吹号角，高擂战鼓，趁蚩尤族部众迷乱失措、丧魂落魄之际，挥麾驱众向蚩尤阵营冲杀过去，经过一场激烈的拼杀，终于一举战胜强劲敌人，并在冀州之野（今河北一带）擒杀了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为主体的华夏集团的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上下毫不骄矜松懈，乘胜东进，一直开进到东夷集团中心地区的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典礼后才凯旋西归。同时，为了施加自己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黄帝还“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逸固书·尝麦》），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了一位能附众的名叫少皞清的氏族首领充当该集团的领袖，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致力于使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相结为同盟，依从于自己的统辖。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复原了。但是正如拉法格在《宗教与资本》中所说：“神话是保存关于过去回忆的宝库”，它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的本身。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涿鹿之战又是真实可信的，它是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部族武装冲突的一个缩影，堪称为中国古代战争的滥觞。

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涿鹿之战的最后胜利，关键在于其战争指导要比蚩尤族来得高明。具体地说，是他们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好战争的准备。既“修德”同心同德，一致对敌；又“振兵”加强军备，发展实力，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和选择战场，巧妙地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把握战机，后发制人，果断及时地实施反击，一举置强大凶狠的敌手于死地，建立起自己在整个北部中原地区中的最高首领地位。相反，蚩尤族方面虽然经济实力相对雄厚，人数较为众多，武器装备比较优良，但是由于其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向外扩张，穷兵黩武，“好战必亡”，早已播下了战败失势的种子。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又光知道死攻硬拚，而不善于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尤其是缺乏对天候条件变化的应急能力，缺乏对黄帝族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惨遭败绩，以至错过了登上盟主宝座，控制中原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其对后世的影响亦至为深远。概略地说，这场战争的规模已超出了单纯氏族部落之间的械斗，而发生在属于不同集团的部族联盟之间，战争的性质已带有部族首领争夺统治权（盟主）的性质。战争的结果，是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战争提高了军事首领的地位，胜利者的英名更加远播四方，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人们所逐步神化。这些情况显示出，涿鹿之

战乃是炎黄五千年文明的奠基之战。

二、“家天下”的催化剂——启伐有扈

当涿鹿战场上的厮杀声沉寂下去之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依然在不断进行，经常杀得难解难分。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共工与颛顼之间“争为帝”的战争，尧舜禹对南方地区三苗集团的长期征伐等等。在频繁的浴血交锋中，战争的性质也开始了合符其逻辑的变化，即开始由单纯的扩大氏族生存空间、实现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缓慢地向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的战争过渡。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大势相同步的，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作用于军事领域的客观产物：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萌芽了，社会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初步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对立阵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战争的性质自然要发生一定的变化；而连绵不断的战争，反过来又增强了社会变革的动力，催化了早期国家的诞生。

尧舜时代王权已经萌芽，禹伐三苗战争的胜利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军事领袖的威望，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加上大禹曾因治水成功而赢得了很大的个人资本，更使得早期国家的诞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大禹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执而戮之”（《国语·鲁语》）等传说来看，大禹时已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联盟，并初具国家的雏型，参加

盟会的各部落酋长要执玉帛晋见盟主，违背命令迟到者则遭杀戮，参加联盟的各部落不再是平等的了。这意味着过去仅限于战场的军事首长权力，现在已逐渐形成一种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王权。

大禹既然拥有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而这种权力又能带来更大的财富和享受，这时自然就不乐意再按照“禅让制”的传统轻易放弃自己家族对联盟祭祀、行政、军事权力的控制。可是面对强大的传统力量，他也不敢贸然废弃“禅让制”成为众矢之的。为此，大禹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依照惯例在议事会上先后提名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任人选；另一方面又积极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使之羽翼丰满，以便伺机用“传子制”取代“禅让制”。大禹的老谋深算最终一一尽遂人愿。当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即杀死伯益，召集钧台（在今河南禹县）大会，宣布自己担任领袖职务，正式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标志着早期国家的正式形成，中国历史从此由原始社会迈入了阶级社会。

传统是一种巨大而雄厚的惰性力量，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形态变革，代表旧传统、旧秩序的势力自然不会轻易甘心，它们不愿意承认现实，总是要千方百计对新的社会秩序提出挑战，并不惜诉诸武力，来恢复和维持旧的民主传统，继续走氏族公社制的道路。这种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没有任何调解的可能，只有通过战争来最后分出胜负，决定取舍，甘之战正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关键一战。换句话说，大禹父子终止军事民主制下的“禅让制”，建立“家天下”的

“传子制”实行王朝统治 成为引发甘之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有扈氏在反抗新秩序的活动中充当了急先锋。关于有扈氏的来历，历史上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观点是说它是夏的同姓氏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为夏的异姓部落。其实这并不重要，问题的要害是它不服夏启接替夏禹掌权的做法，带头用武力反抗夏启的统治，企图凭藉军事手段来恢复过去的原始民主体制。

正在春风得意之中的夏启当然不能容忍有扈氏的嚣张挑战 他决心拿有扈氏开刀 杀鸡儆猴 维护自己的权威 巩固自己的统治。为此，他迅速地做出了出兵平叛的决策，点起一支兵马，浩浩荡荡杀向有扈氏盘踞的地盘。有扈氏闻报夏启前来征伐，也收罗人马，倾巢出动，准备和夏启大军决一死战。

双方军队在甘（在今陕西户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南洛阳西南）这个地方相遭遇。彼此都厉兵秣马，打算在战场上一见高低，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社会发展进程的大决战迫在眉睫。毕竟是夏启更富有政治头脑和军事韬略。他知道要夺取作战的胜利，必须先申明军事纪律，激发起将士们杀敌致胜的勇气。为此他在临战前夕郑重举行了军中誓师活动 宣布战场纪律 发出战斗动员。这就是《尚书》所载的著名《甘誓》。以下就是《甘誓》的大意：

诸位将领和士兵，我现在向你们发布以下的命令：有扈氏倒行逆施，一意孤行 作恶多端 罪不容死。上帝因此要灭掉它。现在我奉行上帝的意志去惩罚这帮恶棍，替天行道，

杀一儆百。我宣布：兵车左边的甲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便是不执行命令；兵车右边的甲士，如果不善于用戈矛刺杀敌人，便是不执行命令；驾驶战车的甲士，如果不懂得驾驭战马的技术，便是不执行命令。凡是坚决执行命令的，战争结束之后，我就在先祖的神位前颁行赏赐；凡是拒不执行命令的，战事完毕，我便在社神跟前实施斩首的惩罚。大家当心一点，我会把你们中间那些不努力完成任务的人以及子女变作奴隶的，以表示严正的惩罚。

在这里 夏启申述了征伐有扈氏的目的 强调了作战的纪律。他的部下听了这通训辞之后，都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自然而然形成了克敌制胜的共识。应该说，夏启的战前动员收到了振奋士气，提高战斗力的很好效果。

战斗终于打响了。夏启的部队在严格军纪的约束下，个个奋勇争先，全力杀敌。有扈氏麾下的将士何曾见到过这样的场面，几个回合下来，顿时阵脚大乱，全线崩溃。夏启乘胜进击，终于全歼敌军，灭亡了一度桀骜不驯的有扈氏，取得了甘之战的彻底胜利。

夏启能够在甘之战中获胜，在于他所代表的是新兴阶级势力的根本利益，他的所作所为，是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相一致的。在于他善于开展战前动员，申明军纪军法，调动参战将士的战斗积极性。在于他正确部署兵力，实施高明的车兵作战战术指挥，尽敌为上，一战而胜。至于有扈氏惨遭败亡，也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乃是它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从事的战争性质上的保守落后。另外，其在作战指导方面也显然是消极被动的，既没有进行必要的战前动员，又

不能做到灵活机动，因敌变化。这样就大大加速了自己走向覆灭的进程。

夏启攻灭有扈的甘地之战，是中国历史踏入阶级社会门槛时，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最后结果，沉重地打击了旧的传统保守势力，无情地粉碎了他们企图恢复旧制度的迷梦，对于夏启确立“家天下”政治秩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此“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夏王朝的统治大大得到了巩固，从而确保了社会历史继续朝着健康正常的方向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甘之战是一场具有重大进步性质的战争，对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 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 —— 商朝和西周的开国战争

- 鸣条之战
- 推翻腐朽的夏王朝
- 商汤兴兵攻伐夏桀
- 牧野之战 武王克殷
- 周公东征
- 西周的全面繁荣

一、吊民伐罪的号角——鸣条之战

《易经·革卦》彖辞说：“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鸣条之战，是我国战争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它是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诸手段的全面综合运用 从而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

夏启攻灭有扈氏之后，夏王朝的统治基本上稳定了下来。但是，普天之下没有铁打永固的江山，夏王朝在经历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重大历史变故后，一步步走向衰微的归宿。到了大约 400 年之后，夏桀登上了君主的宝座。这位末代君主，以他的倒行逆施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他任用嬖臣，骄侈淫逸，对广大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激起臣民的普遍憎恨和反抗。民众愤慨地诅咒他：“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这表明夏王朝的统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彻底灭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同夏王朝无可挽回的衰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周边的方国商，则羽翼丰满，迅速崛起。商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子姓，始祖名契。它开始活动于番、砥石（今河南南部滹沱河、漳水之间）后逐渐南移，进入今河南地区。经过相土、冥、上甲微等历代首领和广大族众的努力开拓，它

逐渐强盛起来，并初步形成了早期国家规模，到夏桀在位期间，它已由夏室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商族已拥有了自己雄才大略、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商汤天乙。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商各方面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其作为中原地区新统治者的地位已是呼之欲出。商汤顺应时势，抓住千载难遇的良机，及时将部族统治中心迁徙于亳地（今河南商丘北），开始积极筹措攻灭夏朝的战略大计。

愚昧骄妄的夏桀对于商汤的战略动态茫然无知，依旧醉生梦死，作恶为虐，这样就在客观上为商汤从事战争准备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商汤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强大政治攻势，为日后鸣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军事战略上，商汤在贤臣伊尹、仲虺等人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积蓄力量，伺机破敌。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做到知彼知己，计出万全。为了彻底察明夏桀集团的内部情况，商汤创造性地开展“用间”活动，大胆派遣伊尹多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了解和掌握了夏王朝内部“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为有针对性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创造了前提。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逐一翦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氏，完成对它的战略包围，最后一举攻克夏邑，取而代之。商汤把第一个打击的目标指向了夏的属国葛（在今河南宁陵北），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消灭了葛国，这既翦除了夏桀的一个羽翼，检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又大大提高了商汤自己的政治

威望。四海之内都赞扬他是正义之师，出征不是为了掠夺财富，各地老百姓像“大旱之望甘霖”一样盼着商汤的军队。商汤便趁热打铁，又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山东鄆城东北）并攻灭夏桀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支柱，即实力较强的昆吾（今河南许昌附近），“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从而基本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打通了最后发动鸣条之战诛灭夏桀的道路。

在商族上下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商汤等人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一步步接近了成功的彼岸，这时传来了夏都到处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民谣的消息，意味着伐桀的时机已到。商汤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果断地决定把灭桀行动付诸实施。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 400 余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顶之灾，仍然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停止向夏桀贡纳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当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向夏桀“谢罪请服，复入职责”，暂时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不久，又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遂再次停止向夏桀贡奉。这一回，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缙氏公开反抗，商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便下令起兵，以实现自己光荣的梦想。

大约在公元前 1726 年左右，商汤正式兴兵攻伐夏桀，揭开了鸣条之战的帷幕。战前，商汤学习当年夏启伐有扈氏时的做法，举行了郑重的誓师活动。在誓师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义正辞严、大气磅礴的训词，一一历举夏桀破坏生

产、施行暴政、残酷盘剥欺压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同时商汤还严肃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和作战要领。这番誓师，和当年的《甘誓》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鼓舞了斗志。

战前誓师仪式结束后，商汤便动用作战性能良好的兵车 70 辆、能征惯战的敢死队 6000 人 会同各同盟国的参战部队 采取大迂回战略“以迂为直”迅速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 突袭夏桀的老巢。

商汤大军压境的消息终于传入夏都，传入夏桀的耳中，一直沉溺于醇酒美人温柔之乡的夏桀这时才如梦初醒，方寸大乱。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得仓猝应战，统帅一批早被歌舞升平生活销磨尽了战斗力的将士，西出去抵御商汤的进攻。于是两军乃在鸣条（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一说在今山西安邑一带 地区相遇 展开了一场生死会战。

旌旗翻卷 鼓角齐鸣 杀声震野 血流成河 鸣条之战打得异常激烈。但毕竟是商汤麾下的将士在各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这既表现为必胜信念的拥有、杀敌勇气的旺盛，也体现为训练有素、武艺高强。夏桀手下的乌合之众怎是这些‘必死’之士的对手 在商汤军队勇猛无比的冲杀之下 夏桀的主力部队终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商汤就这样一举攻克了夏邑，赢得了鸣条之战的胜利。

夏桀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却归依于属国三腹（在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 适时展开战略追击，挥师南下，对溃败逃窜中的夏桀残部实施打

击，攻灭了三腹，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反扑的机会。夏桀穷途末路，只得率极少数残部仓惶逃奔南巢（在今安徽寿县南），他忧怒交加，不久便病死在那里。夏王朝至此宣告彻底覆灭。商汤率师凯旋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有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 3000 诸侯的拥戴，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朝在铁血之中诞生了。

鸣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典型的新旧王朝更替战争。商一举推翻了垂死腐朽的夏王朝统治，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这在当时是合乎广大民众的愿望的，客观上有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此得到后人的普遍肯定和赞扬，被认为是“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吊民伐罪、顺天应人的光辉典范。同时，商汤在此战中所反映出的卓越指挥艺术和才能，对于后世战争的实践和军事理论的构筑，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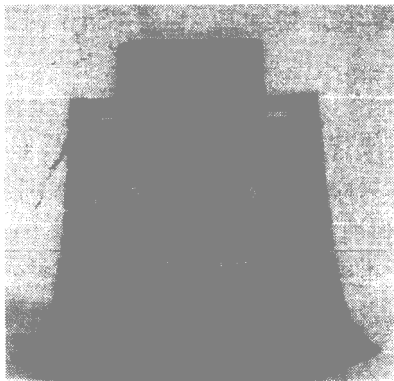
二、从盟津到牧野——武王克殷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历史上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商汤本人当年怎么也不曾料想到，自己兴兵诛灭夏桀的历史场景，时隔数百年后，又会在自己子孙商纣统治末年时——重演，这正是一幕令人感慨万端、不胜唏嘘的悲喜剧。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在历经了初兴、中衰、复振、全盛、衰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期间，已滑向了

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螭如螭，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同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式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周兴起于豳地、岐山（均在今陕西境内）经过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迅速走上强盛的道路，其势力甚至渗透到南方的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且深怀韬略的贤士吕尚（即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 商朝“亚醜”青铜钺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及“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罗致人才，发展生产。为形成政治清明的政治局面，他规定：农民只交纳